

從敦煌本《華嚴經》論晉譯五十卷本與六十卷本 的相關問題

南華大學文學系退休教授兼敦煌學研究中心 榮譽主任
鄭阿財

摘 要

《華嚴經》是大乘佛教修學最重要的經典之一，素有「諸經之王」、「諸經中寶」的美稱。中土早有數十種《華嚴經》的支流別品傳入，有關《華嚴經》完品漢譯本的傳世，主要有三：一為東晉佛陀跋陀羅在所譯的六十卷本，凡三十四品，一般稱為《六十華嚴》。二為唐武后實叉難陀所譯八十卷本，凡三十九品，一般稱為《八十華嚴》或《新譯華嚴》。三為唐德宗般若三藏所譯的四十卷本，一般稱為《四十華嚴》。

敦煌文獻保存有《華嚴經》寫本，總數逾 400 號，在敦煌佛教文獻中占有極大的比重，前賢除了各館藏寫本目錄的著錄及敘錄外，學界重視敦煌本《華嚴經》的研究價值，惜尚未充分展開。特別其中有近 100 號屬於五十卷本的殘卷，寫本的時間相對較早，大抵為南北朝時期寫本。其留存情形正呈現晉譯華嚴經譯出初期具體而珍貴的實況，有助於瞭解六十卷本流行前的情形，釐清晉譯五十卷本與六十卷本間的相關問題。

本論文主要根據今所公布的敦煌文獻華嚴經寫本，輔以吐魯番文獻中的華嚴經殘片，對照今存由金藏廣勝寺本與明永樂北藏本拼合而成而五十卷本《華嚴經》（收入《中華大藏經》第 12 冊），及《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9 冊收錄的六十卷本《華嚴經》，結合佛教史傳及經錄等相關記載，考察晉譯華嚴經五十卷本為重開為六十卷？何為人所重開？如何重開？並論述五十卷本流行與敦煌本流傳的情況，析論五十卷本與六十卷本具體差別與意義極其盛行的時代與區域。

關鍵詞：敦煌寫本、華嚴經、佛陀跋陀羅、五十華嚴

一、前言

《華嚴經》全稱《大方廣佛華嚴經》，素有「經中之海」、「經中之王」之稱。漢譯完品的《華嚴經》一般認為傳世的本子主要有：一、東晉義熙十四年(418)佛陀跋陀羅在揚州道場寺歷時三年完成的六十卷本，凡三十四品，一般稱為《六十華嚴》。二、唐武后證聖元年(695)于闐國三藏法師實叉難陀在東都大內變空寺歷時五年完成的八十卷本，凡三十九品，一般稱為《八十華嚴》或《新譯華嚴》。三、唐德宗貞元十二年(796)闍賓般若三藏於長安崇福寺歷時三年完成的四十卷本，一般稱為《四十華嚴》或《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晉譯佛陀跋陀羅的《六十華嚴》一般以為是漢譯最早的完品。實際上，早期先是以五十卷本流傳，之後重開為《六十華嚴》，而廣為流傳，舊本五十卷遂成罕見。今《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9 冊所收佛陀跋陀羅譯《華嚴經》即六十卷本，而五十卷本《華嚴經》今收入《中華大藏經》第 12 冊，是由金藏廣勝寺本與明永樂北藏本拼合而成¹。

近代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文獻中，保存有大量的中古佛教文獻，是考察漢傳佛教經典發展的珍貴資料。這些漢文佛教文獻，寫本年代為 4 世紀到 11 世紀，也就是從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到北宋初期。在眾多的佛教文獻中，有關《華嚴經》的寫卷據已公布的資料論，約保存有將近 400 號寫卷。²東晉佛陀跋陀羅譯、唐實叉難陀譯、及唐般若三藏譯的三種譯本皆有。其中佛陀跋陀羅譯的《華嚴經》寫卷，有六十卷及五十卷二種系統，尤其屬於五十卷本《華嚴經》殘卷及其系統的異本，為數近百件，且頗多為北朝時期的寫本，既呈現《華嚴經》在敦煌主要流傳的實況，更提供我們瞭解《華嚴經》來華初傳及譯本流行發展的第一手資料，對晉譯《華嚴經》流傳史研究極具價值。

二、敦煌本晉譯《華嚴經》研究述評

1962 年日本京都大學藤枝晃教授在為大谷大學所藏敦煌本《華嚴經》卷第四十七撰寫解題時，除據以論述北魏敦煌鎮官營寫經外，還持與《大正藏》進行文本校勘及寫卷異體字的調查，並注意到晉譯《華嚴經》五十卷本的存在。文中特別提到

¹ 《中華大藏經》，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6。

² 敦煌寫本《華嚴經》據統計約有 400 件。英藏 68 件；法藏 14 件，俄藏 56 號；日藏 15 件（中村不折舊藏 6 件、杏雨書屋羽田亨舊藏 6 件、大谷大學藏 2 件、三井文庫別館藏 1 件）。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196 件。此外，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2 件、甘肅省藏 6 件、天津藝術博物館藏 4 件、北大圖書館藏 3 件、浙圖藏 1 件、上海博物館藏 1 件、上海圖書館藏 5 件、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 3 件，其他藏地 1 件。另臺灣臺北國家圖書館 5 件，中華海峽兩岸文化資產促進會藏 1 件。

宋以前晉譯《華嚴經》的寫本更多是由五十卷構成的³。1998年，《敦煌學大辭典》出版，方廣錫在為辭典撰寫『大方廣佛華嚴經』詞條時，更關注到敦煌本中東晉佛陀跋陀羅《大方廣佛華嚴經》初譯的五十卷本及之後重開的六十卷本，以為：「匯總全部殘卷，已不足綴成一部完整的《華嚴經》。但敦煌文獻中的五十卷本《華嚴經》不但反映了該經的最早形態，而且抄寫年代較早，大體上均為南北朝時期的寫本。」基本上已指出敦煌本《華嚴經》的研究價值⁴，可惜未見有進一步的展開。

此外，除了各館藏寫本目錄的著錄及敘錄有所觸及外，似乎未見有相關專文進行探究。直至2004年日本北海道大學舉辦『日本學、敦煌學、漢文訓讀的新開展』國際學術會議，會中韓國李丞宰以〈探尋敦煌佛經的50卷本《華嚴經》〉⁵為題宣讀論文，主要據北大D029及英藏S.235等10件敦煌《華嚴經》寫本與再雕本《高麗藏》、《大正藏》進行比對，說明敦煌本《華嚴經》五十卷本的存在。2006年李氏更出版了《50卷本〈華嚴經〉研究》⁶一書，是最早討論五十卷本《華嚴經》的專著。書中蒐羅日、韓等國博物館藏及敦煌寫本中五十卷本《華嚴經》的寫卷，藉以略析《華嚴經》的早期形態。主要比對50卷本與60卷本的卷次，並對異體字進行比勘。惜涉及敦煌寫本相當有限，校勘也較粗疏。不過，此書披露韓國湖林博物館藏初雕《高麗藏》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一、卷三十七、卷四十七、卷四十八等四卷，以及誠庵古書博物館藏《華嚴經》卷二十一等，提供考察五十卷本另一珍貴資料，初具五十卷本研究的規模。

2008年，李海峰《敦煌遺書中的早期〈華嚴經〉及其相關文獻》⁷一文，對敦煌寫本中早期《華嚴經》的寫卷及相關文獻進行初步梳理與數量的統計，並分析相關題記所反映的時代問題，考察當時《華嚴經》的翻譯、流行、信仰者心理及抄經人等情況。該文統計《華嚴經》文獻包括本部經典加上支品、注疏等合計凡220件，非以五十卷本為主。雖資料不夠完備，論述相對寬泛粗疏，但却是華人中較早對敦煌本《華嚴經》進行關注的專文。

³ 藤枝晃：〈大谷大學所藏敦煌本「華嚴經」卷第47解題〉，《墨美》120，1962.8，頁18-21。

⁴ 1998年方廣錫為《敦煌學大辭典》撰寫『大方廣佛華嚴經』詞條時說：「《大方廣佛華嚴經》又名《晉譯華嚴經》、《華嚴經》、《六十華嚴經》或《舊譯華嚴經》，為印度大乘佛教主要經典。東晉佛陀跋陀羅義熙十四年(418)於揚州（即建康，今江蘇南京）道場寺開譯，南朝宋永初二年(421)譯畢。五十卷，後由慧觀等人校訂重審，開為六十卷。兩種卷本同時流通。北圖藏有乃37、芥92、麗31等約四十號，兩種卷本均有，以五十卷本為主；英、法、俄、日等國亦藏有數十號。但匯總全部殘卷，已不足綴成一部完整的《華嚴經》。……敦煌文獻中的五十卷本《華嚴經》不但反映了該經的最早形態，而且抄寫年代較早，大體上均為南北朝時期的寫本。其中不少經卷為該精義出後不久的寫本，彌足珍貴。」（見《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頁654-655）。

⁵ 論文收入石塚晴通編：《敦煌學·日本學：石塚晴通教授退職紀念論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36-51頁。

⁶ 李丞宰：《50卷本〈華嚴經〉研究》，首爾：首爾大學出版社，2006年。

⁷ 李海峰：《敦煌遺書中的早期〈華嚴經〉及其相關文獻》，《中國文化研究》2008年秋之卷。

2014 年，上海復旦大學張小豔教授指導碩士生傅及斯以《敦煌本〈華嚴經〉整理與研究》為題撰寫論文⁸，研究範圍擴大到現存可知的所有敦煌寫本《華嚴經》。論文將篩檢所得敦煌寫本《華嚴經》殘卷 377 件，逐一進行敘錄，並將其中 104 件殘卷綴合成 41 組。在文獻整理的基礎上，辨析考察晉譯 50 卷本及其他的異寫本，並對部份疑偽寫卷進行考辨。全文分為六章，凡 20 萬字，是近年敦煌寫本《華嚴經》文獻全面、系統的整理研究。其中第四章〈敦煌本晉譯《華嚴經》的分卷〉探討了「五十華嚴」與「六十華嚴」的分卷，晉譯華嚴中的異本，以及從寫卷紀年看晉譯華嚴的分卷問題……等。論述紮實有據，值得參考。同年，傅及斯又與指導教授張小豔合撰〈敦煌本「晉譯五十華嚴」殘卷綴合研究〉⁹，通過殘字拼接、內容連續、行款相同、字跡風格近似等不同角度的比較分析，將敦煌文獻 26 號晉譯「五十華嚴」寫經殘卷（片）屬於同一寫卷而被撕裂為數號者，綴合為十一組，並進行相關寫本的分卷與定名，大大的推進了敦煌本《華嚴經》的研究發展。

另外，香港崔中慧也從佛教寫經與書法的視角出發，針對敦煌、吐魯番的《華嚴經》寫本進行探研，先後發表了〈吐魯番出土北涼且渠安周供養《佛華嚴經》研究〉¹⁰、〈敦煌藏經洞出土北魏《華嚴經》寫本研究〉¹¹等論文。前篇主要從書法風格進行考察，針對日本書道博物館藏吐魯番土峪溝出土北涼且（沮）渠安周供養的《華嚴經》卷第廿八殘卷，討論「北涼體」書法產生的獨特文化現象；後篇則針對幾件敦煌北魏《華嚴經》寫本殘卷，將其置於北魏宣武帝的歷史背景下，透過寫經題記析論當時敦煌官方寫經組織與寫經生，並論述與龍門石窟石刻題記字體的關係，分析北魏佛經書寫所具的南方書風及其成因等。基於專研書法，譯經史論非其所重，故籠統將這些寫本視為晉譯六十《華嚴》寫經殘卷，因而未能涉及五十《華嚴》相關問題之探討，殊為可惜。

總體而論，自敦煌文獻發現以來，由於寫卷散藏世界各地，原卷獲睹不易，初期僅能從各館藏陸續公布的寫本目錄略窺一二，難有整體考察。近年隨著各國度藏寫卷的陸續公布與縮微膠卷的流通，特別是 1990 年以後，大型敦煌文獻寫本圖錄的印行與流通以及『國際敦煌學項目』(IDP)，大量數位掃描影像的上網，提供彩色清晰的敦煌文獻寫卷圖檔，提升了敦煌文獻專題系統研究的條件，敦煌寫本《華嚴經》的研究也在既有的基礎上，得以逐漸開展。

⁸ 傅及斯：《敦煌本〈華嚴經〉整理與研究》，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 年。

⁹ 張小豔、傅及斯合撰〈敦煌本「晉譯五十華嚴」殘卷綴合研究〉，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6 期，頁 13-26。

¹⁰ 崔中慧：〈吐魯番出土北涼且渠安周供養《華嚴經》研究〉，《華嚴學報》第 6 期，2013.12，頁 217-262。

¹¹ 崔中慧：〈敦煌藏經洞出土北魏《華嚴經》寫本研究〉，《2016 年第五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華嚴專宗學院，2016。

敦煌文獻中的《華嚴經》寫本，總數約有 400 號，具有考察《華嚴經》流傳史的研究價值，特別是東晉佛陀跋陀羅譯本的寫卷，其中有近 100 號是屬於五十卷本的殘卷，寫本的時間相對較早，大抵為南北朝時期及隋唐之前的寫本。這些寫卷留存的情形正呈現出晉譯《華嚴經》初出時流傳的具體實況，有助於瞭解六十卷本流行前後的情形，釐清五十卷本與六十卷本間的相關問題。

有鑑於此，本文特根據今所公布的敦煌文獻《華嚴經》寫本，輔以吐魯番文獻中的《華嚴經》殘卷，對照今存由趙城金藏廣勝寺本與明永樂北藏本拼合而成的五十卷本《華嚴經》（收入《中華大藏經》第 12 冊），及《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9 冊以再雕高麗藏為底本的六十卷本《華嚴經》，結合佛教史傳及經錄等相關記載，考察晉譯《華嚴經》實際流傳的情形，探究五十卷本為何重開為六十卷？何人所重開？如何重開？並論述五十卷本流行與敦煌本流傳的情況，析論五十卷本與六十卷本具體差別與意義及其盛行的時代與區域。¹²

三、經錄與藏經所見晉譯《華嚴經》

要考察東晉佛陀跋陀羅譯本《華嚴經》卷本與流傳情況，歷代佛教經錄、歷代大藏經的查考為第一要務，其次是佛教史傳資料對譯經過程的相關記述，之後則是敦煌寫卷中《華嚴經》早期寫本的印證。茲列述如下：

（一）歷代經錄有關佛陀跋陀羅譯《華嚴經》的著錄

「佛經目錄」，又稱「眾經目錄」、「一切經目錄」，省稱「經錄」，指的是用來記載佛典的名稱、卷帙、譯撰者和有關事項的一類佛教典籍。歷代佛教目錄眾多，今所知以東晉道安(314-385)所撰收錄後漢至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374)頃，約二百年間漢譯佛典及注經的《綜理眾經目錄》為最早。然原書已佚，梁·僧祐《出三藏記集》保存有主要內容，可略窺大要。中土有關《華嚴經》的翻譯，自後漢·支讖譯《兜沙經》一卷以下，有吳·支謙譯《菩薩本業經》一卷、道真譯《菩薩本願行品經》一卷、西晉·竺法護譯《菩薩十住經》一卷等等，這些支流別品的傳入與譯介，為完品《華嚴經》的翻譯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完品全本《華嚴經》漢譯出，首推東晉·佛馱跋陀羅(359-429)的譯本為最早。是唐武后證聖元年(695)于闐國三藏法師實叉難陀新譯三十九品八十卷的《華嚴經》廣為流行前，中土普遍流傳的《華嚴經》。

¹² 至於敦煌寫本所見五十華嚴寫本的文獻整理校錄及系統析論等問題，則由莊惠娟同學撰寫論文處理中。莊慧娟：《敦煌本〈五十華嚴〉之文獻研究》，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初稿撰寫中，預計 2019 年 7 月完成。

歷代佛經錄目自梁·僧祐《出三藏記集》起，隋·法經《眾經目錄》、費長房撰《歷代三寶紀》、彥琮《眾經目錄》，唐·道宣《大唐內典錄》、靜泰《眾經目錄》、靖邁《古今譯經圖紀》、智昇《開元釋教錄》……等對晉譯多所著錄，反映了唐前《華嚴經》翻譯與流通的種種珍貴訊息。

上列經錄中，以梁·僧祐(445-518)所撰成於天監九至十三年(510-514)的《出三藏記集》為最早。其卷二「新集撰出經律論第一」下著錄：「《大方廣佛華嚴經》五十卷（沙門支法領於于闐國得此經胡本，到晉義熙十四年三月十日，於道場寺譯出，至宋永初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都訖。）」（CBETA, T55, no. 2145, p. 11c9-10）

其後，隋開皇十四年(594)法經等奉詔撰輯的《隋眾經目錄》（又稱《法經錄》）卷1：「《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晉義熙年，沙門佛陀跋陀羅等共法業等揚州譯。）」（CBETA, T55, no. 2146, p. 115, a11-12）

開皇十七年(597)費長房撰《歷代三寶紀》卷3：「宋（庚申）武帝裕（稱永初元）（辛酉）二（覺賢於道場寺。譯華嚴經五十卷或六十卷。）起義熙十四年至此訖六十（曇無讖譯經至此年都訖。）」（CBETA, T49, no. 2034, p. 41, a7-8）又卷7：「《華嚴經》五十卷（義熙十四年於道場寺出。至宋永初二年方訖。或六十卷）。見竺道祖《晉世雜錄》」（CBETA, T49, no. 2034, p. 71, a8）

隋仁壽二年（602年）彥琮等撰《眾經目錄》（簡稱《彥琮錄》）卷1：「《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或五十卷）晉義熙年，佛陀跋陀羅共法業等於揚州譯」（CBETA, T55, no. 2147, p. 150, c10-12）。

唐·靖邁約撰於貞觀年間(627-649)的《古今譯經圖紀》，卷2著錄有：「沙門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以晉安帝隆安二年歲次戊戌，至宋永初二年辛酉，於揚都廬山二處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觀佛三昧經》（八卷）……總一十五部，合一百二十五卷，並究其幽旨，妙盡文意。沙門法業、慧義、慧嚴等筆受。」（CBETA, T55, no. 2151, p.356c-357a）

唐麟德元年(664)道宣撰《大唐內典錄》，卷6著錄有：「《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一千八十七紙或五十卷者南本）東晉義熙年佛陀跋陀羅於揚都譯」（CBETA, T55, no. 2149, p. 285, a29-b1）又卷9：「《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或五十卷一千八十七紙紙二十八行）東晉義熙年佛陀跋陀羅於揚都譯」（CBETA, T55, no. 2149, p. 313b7-8）唐高宗麟德二年(665)釋靜泰撰《眾經目錄》卷一「《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一千八十七紙）晉義熙年，佛陀跋陀羅共法業等於揚州譯 成五十卷」（CBETA, T55, no. 2148, p. 181c16-18）

唐開元十八年(730)智昇撰編的《開元釋教錄》，此為唐代佛典目錄中最詳實而

權威的集大成之作。卷 3 著錄有：「《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初出元五十卷，後人分為六十。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得梵本來，義熙十四年三月十日於道場寺出，元熙二年六月十日訖，法業筆受，見祖、祐二錄）」(CBETA, T55, no. 2154, p. 505, b20-22)

以上經錄有關《大方廣佛華嚴經》的著錄，以梁·僧祐的著錄為最早。經錄中說明晉譯《大方廣佛華嚴經》係佛陀跋陀羅據沙門支法領於于闐國所得胡本，晉義熙十四年(418)三月十日在道場寺開始漢譯，至宋永初二年(421)十二月二十八日完成，全本五十卷。只提五十卷，並未提及六十卷本。

至於經錄著錄《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則是始見於隋《眾經目錄》(《法經錄》)、《歷代三寶紀》、《彥琮錄》，唐《大唐內典錄》、《靜泰錄》、《開元釋教錄》等，著錄六十卷本時多同時標示有「或五十卷」。說明當時五十卷、六十卷兩種本子是同時流通的，依著錄敘述情形論，呈現的是以六十卷為主體。

而撰於貞觀年間的《古今譯經圖記》，此記對漢譯佛典，是隨時代之別，而追記譯者，並附加譯者事蹟。其中對佛跋陀羅此一人物事蹟、譯經情形多所記述，紀錄中對《大方廣佛華嚴經》僅標注六十卷，而不及五十卷，這是初唐時，此一現象較為特殊。《房山石經》中貞觀八年(634)刻的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也是六十卷本，而不見五十卷本。

另外，較為值得注意的是《大唐內典錄》、《靜泰錄》著錄《大方廣佛華嚴經》時，除標示「六十卷一千八十七紙」，特別《大唐內典錄》還標注「或五十卷者南本」。中國佛經流傳史上，出現過許多經典南北地區流通有不同卷帙的本，以致於有北本、南本之稱。如《大般涅槃經》的漢譯，現存有三種：一為東晉法顯、佛大跋陀、寶雲等合譯《大般泥洹經》六卷；二為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四十卷，經錄中有時又作三十六卷，也稱作「北本」；三為劉宋·慧嚴、慧觀、謝靈運等依以上兩種譯本為基礎，合本對照修治而成的《大般涅槃經》三十六卷，也稱作「南本」。《大唐內典錄》稱《大方廣佛華嚴經》五十卷為南本的提法，也似乎意味著當時唐代長安洛陽等北方地區，流通的是六十卷本，五十卷為南方偶見採用的本子。是東晉·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在隋唐以前流傳的本子主要為五十卷本，重開的六十卷本，則在隋唐之後，漸趨流行，而成唐代風行的主流經本。唐武后證聖元年(695)實叉難陀新譯三十九品八十卷本的完成，大為風行。佛陀跋陀羅譯的五十卷本雖存，已是罕為人知。

(二) 歷代藏經收錄佛陀跋陀羅譯的《華嚴經》

上述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出經律論錄」、唐·靖邁《古今譯經圖記》、等，

是列記佛典標題、卷數、著者及譯者等譯經目錄。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唐·智昇《開元釋教錄》主要為入藏錄。是正式編入藏經的佛典目錄。

「大藏經」魏晉南北朝時稱為「眾經」，隋唐時又稱「一切經」，是將佛教經典按照一定的次序整理，匯集成有組織有系統的圖書收藏入庫，稱之為「入藏」，是佛教法寶的總匯。歷代官方或佛教寺院，乃至在家居士為了佛教法寶的保存與流通，每有纂輯、刊刻。隋·沙門靜琬（智苑）為了因應佛法毀滅後，復使佛經流通於世，開始於北京房山縣雲居寺石經山，刻經於石入藏，是佛教大藏經的石刻。歷唐、遼、金，至於明朝末年。史稱《房山雲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經》，通稱《房山石經》。之後，隨著雕版印刷發達與佛經刊印的普及，自北宋開寶四年(971)敕令益州（今四川省）雕刻《開寶藏》以來，歷代不斷有各種大藏經的編印，除開寶藏外，如磧砂藏、嘉興藏、遼藏、趙城金藏、元《普寧藏》、明《洪武南藏》、永樂北藏、永樂南藏、《徑山藏》、清《乾隆藏》、《中華大藏經》、《佛光大藏經》，日本《卍字正藏》、《卍字續藏》、《大正藏》、韓國的《高麗藏》……等，代有所出。我們從歷代各版本大藏經收入的佛典卷帙、版本加以析論，既可持與歷代經錄的著錄相互印證，同時也有助於佛教典籍存佚、流通之考察。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的《華嚴經》歷代有五十卷本與六十卷本的流傳。其經錄著錄情況如上，而歷代大藏經收入的情形，依據藏經時代先後，依次將其要者條列如下：

1.唐 太宗貞觀八年(634)刻《房山石經》No.27（東晉）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

2.北宋 太祖、太宗年間(971-983)《開寶藏》No.80《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等譯五十卷。帙號千字文：湯-道

3.北宋 神宗元豐3年(1080)《崇寧藏》No.81《大方廣佛華嚴經》五十卷。帙號千字文：坐(105)-垂(109)

4.南宋 高宗紹興2年(1132)刻竣《圓覺藏》(《思溪藏》)No.78《舊譯華嚴經》六十卷。帙號千字文：坐(105)-垂(109)

5.南宋 高宗紹興八年(1138)《資福藏》No.81《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帙號千字文：坐(105)-垂(109)

6.金 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趙城金藏》No.79《大方廣佛華嚴經》五十卷。帙號千字文：湯-道

7.高麗 高宗三十八年(1251)《再雕高麗藏》No.79《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天竺三藏佛跋多羅譯，六十卷。帙號千字文：湯-道

8.南宋理宗至元英宗至治二年間(1225-1322)《磧砂藏》No.81《大方廣佛華嚴經》晉·佛陀跋陀羅等譯，六十卷。帙號千字文：坐1(105)-垂12(109)

9.元 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普寧藏》No.78《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帙號千字文：坐(105)-垂(109)

10.明 太祖洪武年間(1372-1399)《洪武南藏》No.77《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等譯，六十卷。帙號千字文：坐1(105)-垂12(109)

11.明 英宗正統五年(1440)《永樂北藏》No.103《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佛陀跋陀羅等譯，六十卷。帙號千字文：湯-垂

12.清 聖祖康熙五十一年(1712)《嘉興藏》No.83《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佛陀跋陀羅等譯，六十卷。帙號千字文：湯(104)-垂(109)

上列藏經中，北宋時的《開寶藏》、《崇寧藏》收錄的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為五十卷本。金代山西潞州實公法師、崔法珍首倡，私人募資雕刻的《趙城金藏》由於是覆刻北宋開寶藏，因此也是五十卷本。韓國高麗朝顯宗2年(1011年)開雕，宣宗4年(1087年)刻竣的高麗大藏經(又稱《初雕高麗藏》)因也是北宋開寶藏的覆刻，所以也是五十卷本。初雕版1232年燬於大火，1237年再次雕造，至1249年完工，史稱《再雕高麗藏》，即今傳世的本子，其所收錄佛陀跋陀羅譯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則為南宋普遍使用的六十卷本。今韓國湖林博物館藏有《初雕高麗藏》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五十卷本殘本，存卷第一、卷三十七、卷四十七、卷四十八等四卷，是北宋開寶藏覆刻的遺存。另，日本宮內省圖書寮一切經，省稱「宮本」，主要為北宋崇寧萬壽藏(福州東禪寺本)(1080-1140)與毗盧藏(福州開元寺本)(1115-1150)合成的全藏，也是五十卷本。

此外，各種藏經所收均為六十卷本。如：清代以後的《乾隆藏》、《縮刻藏》、《佛教大藏經》乃至日本《卍正藏》、《大正藏》……等各藏經收錄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也都是六十卷本。換言之，北宋版各藏經收錄的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均為五十卷本，北宋以後各藏經則都是六十卷本。高麗藏初雕毀損後，再雕只用八十卷本，說明唐武后證聖元年(695)實叉難陀新譯的八十卷本，凡三十九品，以其完整而成為盛唐後《華嚴經》最為通行的本子，《六十華嚴》相對已漸不流行，而五十卷本則更罕見。直到1984-1996北京中華書局《中華大藏經》，才又根據金藏廣勝寺本與明永樂北藏本拼湊出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五十卷本出版。

四、敦煌本呈現晉譯《華嚴經》五十卷本的流傳

上節所列歷代經錄中有關《華嚴經》的著錄，隋以前均為五十卷，而未見有六十卷本。隋代的《法經錄》、《歷代三寶記》才開始有六十卷本的著錄，並有「或五十卷」的標示。據此以推，六十卷本應該在開皇十四年(594)《法經錄》完成前就已盛行。日本木村清孝曾據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1說：「此土所傳六十卷本，是彼十萬頌中前分三萬六千頌要略所出也。」推測說：「由法藏稱中國來的《華嚴經》為『六十卷本』可知，在初唐時代，這已成為一般普遍化的事了。」¹³

木村教授對於《華嚴經》五十卷本及六十卷本在唐代流傳的推論與說法基本可信，我們從上節經錄與藏經所呈現出晉譯《華嚴經》著錄與入藏的情況可以得到一定的印證。不過木村教授也對：何時？是誰？將其（晉譯《華嚴經》）改為六十卷本，發出了遺憾與感嘆說：「沒有可明確回答此問題的資料。」

確實，五十卷本為何重分為六十卷？何時分卷？怎樣分卷等問題，唐前經錄、史傳均不得其詳。我們綜合經錄與史傳資料有關晉譯《華嚴經》的記載，可以確定的是：五十華嚴與六十華嚴同為佛馱跋陀羅所譯。初譯時，《華嚴經》以五十卷本流傳，後來人們又將其再重開分為六十卷本。隋代以前，多五十卷本，隋代以下的經錄已有六十華嚴的著錄，而五十卷本華嚴也同時流通。

近代敦煌吐魯番發現的大量寫本文獻，其中吐魯番文獻大多為殘片，敦煌寫本頗多《華嚴經》五十卷本及六十卷本的遺存，尤其是唐前南北朝到隋代的寫本，特別有抄寫年代可呈現五十卷本與六十卷本實際流通年代與地域分布情形，對於五十卷與六十卷卷次品第開合問題的考察，提供了可貴的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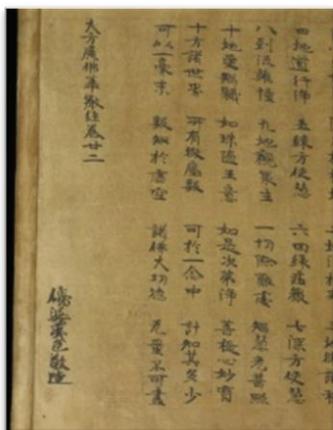
（一）如何判斷敦煌寫本中的晉譯五十卷本

敦煌文獻中的《華嚴經》寫本約有 400 件。分屬東晉佛陀跋陀羅的譯本、唐武后實叉難陀譯的八十卷本《八十華嚴》及唐德宗般若三藏所譯《四十華嚴》。而以晉譯的寫本為最多。同為晉譯佛陀跋陀羅譯本的寫卷中又分屬五十卷本與六十卷本。然今存敦煌寫卷都為殘卷，且大部分經題卷次多殘缺，東晉佛陀跋陀羅的譯本五十卷本與六十卷本內容完全相同，文字也是一致，只是分卷方法有異，因此如何判定這些敦煌寫本《華嚴經》殘卷究竟屬五十卷或六十卷，是第一要務。

首先是過濾原卷保存有經題卷次及品第之寫本，依據原卷照片、圖錄及數位

¹³ 木村清孝著、李惠英譯《中國華嚴思想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頁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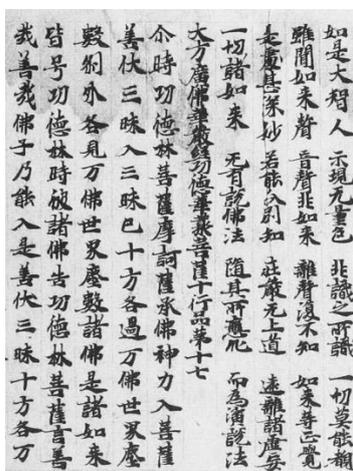
掃描影像，逐一檢閱。並將文本內容持與《大正藏》所收六十卷華嚴及《中華藏》五十華嚴對照，可依經題卷次品參照，並尋求文本相應而得知者，如：



BD00985 首缺尾完。存 677 行，尾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廿二》，題記：「優婆夷包敬造」。起：「欲□ 修諸佛，……諸佛轉法輪」，訖：「可以一毫末，數知於虛空，諸佛大功德，無量不可盡。」對應《大正藏》六十卷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7：「欲修諸佛力無所畏、不共法、無能壞者，欲順行諸佛轉法輪力」到「可以一毫末，數知於虛空，諸佛大功德，無量不可盡。」(CBETA, T09, no. 278, p0568a05- p. 578a3)卷次品第開合與六十卷本不同，而與《中華大藏經》五十卷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廿二》(十二冊，頁 286a9)日本「宮內省圖書寮」(宮本)本、《中華大藏經》五十卷本相同。



又如：中村不折 13 號吐魯番吐峪溝出土的寫卷。首殘尾完。存 19 行，尾題《佛華嚴經卷第廿八》，題記：「涼王大且渠安周所供養經」。起：「唯無上法王，……應滅能寂滅，應起能令起」，訖：「如來性起法，世間莫能知，我所說少分，饒益眾生故。」對應《大正藏》六十卷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4(CBETA, T09, no. 278, p0615c01-p. 616a8-9)，《中華大藏經》五十卷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廿八》第十二冊，頁 348b1-c6。卷次品第開合與六十卷本不同，文獻分卷與日本「宮內省圖書寮」本、《中華大藏經》五十卷本相同。



又敦煌殘卷缺經題卷次，但有品第可資參考，對照文本內容而得知者，如：BD14919 首尾俱缺，存 175 行。有中題：「大方廣佛華嚴經功德華聚菩薩十行品第十七」起：「譬如六情識，迭用互不同」訖：「音辭鄙穢毀辱菩薩。又此眾生，各有無量阿僧」。對應《大正藏》六十卷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0：「譬如六情識，迭用互不同」(CBETA, T09, no. 278, p. 464c29)到卷 11(CBETA, T09, no. 278, p. 467c7-8)與《中華大藏經》五十卷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九》第十二冊，頁 106c8-110a5 相同。敦煌本 BD14919 中題：「大方廣佛華嚴經功德華聚菩薩十行品第十七」為《大正藏》《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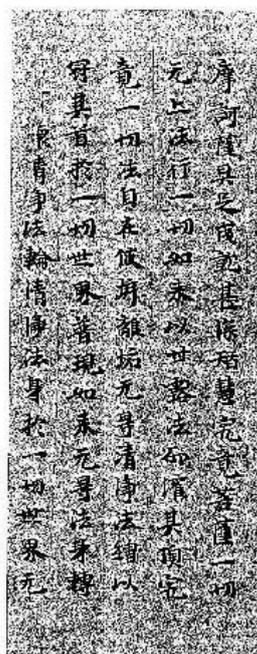
首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一功德華聚菩薩十行品第十七之一」(CBETA, T09, no. 278, p. 466b2-5)是卷次品第開合與六十卷本不同，文獻分卷與《中華大藏經》五十卷本卷九相同。

以下先將原卷保存有經題卷次及品第之寫本，確定其為五十卷本者，依卷次先後及寫卷編號表列如下：

卷一	BD11372+BD9905+BD4031 (尾題)	卷廿六	缺
卷二	上圖 077 (尾題)	卷廿七	S.593 (尾題)
卷三	BD10487 (尾題)、S.2724 (尾題)	卷廿八	中村不折 13 (尾題)、 中國國博館寫經 40?(首尾題卷 29)
卷四	BD127 (尾題)、S.5362 (尾題)、 S.5396 (尾題)、 S06784+中村 55 (首、尾題)	卷廿九	中國國家博物館寫經 40(首、尾題)
卷五	BD2994+BD14479 (尾題)、S.2460 (尾題)、S.06852 (中題)	卷三十	S.6650 (尾題)、 BD11650+BD02080 (無題記)
卷六	缺	卷卅一	北大 D120+BD4949 (尾題)
卷七	上圖 92 (中題)、S.03414 (中題)	卷卅二	P.2110 (尾題)、BD14528 (尾題)
卷八	S.5141 (中題)、S.58141 (中題)、 φ149 (中題)	卷卅三	BD14528?(尾題卷 32)、S.1608(尾 題)、上圖 67 (尾題)、
卷九	P.4808+P.4713、Dx910+BD15770、 S.2245 (尾題)、S.2527 (中、尾題)	卷卅四	浙敦 12 (尾題)、
卷十	羽 436 (尾題)	卷卅五	P2110 (尾題)
卷十一	上博 37 (尾題)	卷卅六	BD14438 (尾題)
卷十二	北大 D029 (尾題)	卷卅七	S.6547 (首、尾題)
卷十三	缺	卷卅八	缺
卷十四	津藝 55 (尾題)、上圖 22 (尾題)	卷卅九	S.9141
卷十五	BD6247 (尾題)、S.305 (首、尾題)	卷四十	BD04332 (尾題)
卷十六	S.3423 (尾題)	卷卅一	缺
卷十七	津藝 38 (尾題)	卷卅二	缺
卷十八	BD7817+BD1312 (尾題)	卷卅三	BD3440 (尾題)
卷十九	S.5361 (尾題)	卷卅四	S.1319 (尾題)、中村不折 26 (尾 題)
卷二十	S.4252 (尾題)	卷卅五	BD15668+BD14838 (尾題)、 敦博 5 (首、尾題)

卷廿一	缺	卷卅六	S.1381 (尾題)、S.1848 (尾題)、BD6068 (無題記)
卷廿二	BD00985 (尾題)、BD07786 (尾題)	卷卅七	S.4520、敦博 5 (首、尾題卷 45)?、台北國圖 115 (尾題)
卷廿三	缺	卷卅八	S.0235 (尾題)、BD14794 (尾題)
卷廿四	缺	卷卅九	S.1529 (尾題)、BD6303 (尾題)
卷廿五	dx18510 (尾題)、S.03489 (首題)	卷五十	羽 179 (尾題)

雖誠如方廣錫所說的敦煌寫本《華嚴經》寫卷「匯總全部殘卷，已不足綴成一部完整的《華嚴經》。」但從上表確知敦煌本屬五十華嚴的寫卷，雖缺卷六、十三、廿一、廿三、廿四、廿六、卅八、卅一、卅二等九卷，但總計已有四十一卷之多，大抵可以勾勒出早期五十卷本流傳的樣態。在這些寫卷中，原卷有抄寫題記可資判斷年代的計有 29 件，抄寫年代較早，大體為南北朝到隋的抄本，甚至有距佛陀跋陀羅譯出時間劉宋永初二年(421)僅僅相差二、三十年流通的寫本，如：日本書道博物館藏中村不折 13 號北涼王大且(沮)渠安周所供養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廿八。



至於有些寫卷首尾俱殘，既無經題卷次，又無品第標目可資參考判定，我們可在前賢既有的基礎上，根據寫本原卷照片、圖錄及數位掃描影像，逐一檢閱。並透過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檢索其內容文字見於《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09 冊(華嚴部)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60 卷) T09n0278 對應的情形，先行判別。如敦煌寫本同一卷文本分別對應六十卷華嚴的前後卷，當可排除其為六十華嚴，再審其書寫字體風格若是具隸意楷書，屬南北朝風格者，極可能為五十卷本。例如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西域文獻遺珍》收錄的三件

6 世紀寫本殘卷便是。其中《西域文獻遺珍》066 號寫卷，《院藏西域文獻總目》敘錄作：《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三十九、卷第四十〔離世間品第三十三之四、之五〕東晉佛馱跋陀羅譯 六世紀南北朝寫本〔隸楷〕。按：首尾俱缺。無經題卷次品第。存 525 行，行 17 字。起：「若菩薩摩訶薩安住此法，則得一切諸佛無」，訖：

「清靜法身於一切世界無」。對應《大正藏》60 卷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9(CBETA, T09, no. 278, p. 650b23~656b5)是卷次品第開合與六十卷本不同。文本內容與《中華大藏經》五十卷本卷三十四同。(見頁 407b17~415b10)。《中華藏》此卷為明永樂北藏拼合，其品第開合與《大正藏》60 卷本同。

(二) 敦煌與吐魯番出土唐前有紀年《華嚴經》寫本殘卷

敦煌寫經的標題，一般抄錄的位置，或載於經文首尾兩處（首題、尾題），或載於正文之中（中題）。

敦煌寫經題記，通常抄於經末，記載寫經因由，包括造經者的姓名、身分，書寫的年月、地點、抄經目的、書手姓名等資料。所以透過寫經題記可以瞭解寫本的性質，審悉寫本抄校的情況，考探寫本的出處，判斷寫本的年代，更可考知佛經寫本的流傳，對漢傳佛教發展，佛經傳播的歷史與敦煌民眾的佛教信仰及社會文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敦煌吐魯番文獻中具有題記的《華嚴經》寫卷，數量不少，其中有紀年可考的唐前寫經，計有二十九件，均屬於東晉佛陀跋陀羅翻譯的五十卷本。抄寫時間除一件為五世紀中期外，其他均為六世紀寫本，字體均為帶有隸意的楷書。茲依抄寫年代及卷次先後表列如下：

敦煌與吐魯番出土唐前有紀年《華嚴經》寫本殘卷

	年代	卷號	卷次	紀年	題記
1	444-460	中村不折 13 (吐峪溝)	卷廿八	承平二年~十八年前	涼王大且(沮)渠安周 ¹⁴ 所供養經
2	513	BD14472	卷八	延昌二年四月十七日	敦煌鎮官經生令狐禮太寫, 典經師令狐崇哲。
3	513	S.2067	卷十六	延昌二年七月十九日	敦煌鎮經生令狐禮太寫寫此經成訖。典經師令狐崇哲
4	513	羽 4	卷廿四	延昌二年八月廿七日	敦煌鎮經生令狐崇哲所寫經成訖竟

¹⁴ 沮渠安周(?-460), 北涼國君主, 匈奴支系盧水胡族人, 沮渠蒙遜之子, 沮渠牧犍、沮渠無諱之弟, 牧犍在位時被任命為樂都太守。北涼永和七年(439)北魏攻姑臧, 牧犍出降, 無諱據酒泉自保, 一度向北魏投降, 惟不久北魏仍以無諱終為邊患而討之, 無諱敗退, 安周乃奉無諱之命西渡沙漠攻擊鄯善。442 年, 無諱西行與安周會師, 並佔領鄯善, 不久並佔領高昌。北涼沮渠無諱承平二年(444), 無諱死, 安周繼立, 不改元, 承平十八年(460), 柔然攻高昌, 沮渠安周被殺, 高昌北涼滅亡。清光緒間吐魯番哈喇和卓出土有北涼承平四年(445)刻《沮渠安周造佛寺碑》, 內容記載安周崇奉佛教, 興建寺廟, 抄造佛經亦當在此後不久。如日本書道博物館藏吐魯番出土寫經《佛說菩薩藏經》第一, 有題記:「大涼王大且渠安周所供養經, 承平十五年(457)歲在丁酉」。

5	513	S.6912	卷卅四、 卅五	〔延昌二年〕六月十三日	敦煌鎮經生□□寫成訖
6	513	P.2110	卷卅五	延昌二年六月廿三日	敦煌鎮經生師令狐崇哲
7	513	S.9141	卷第卅九	延昌二年七月十五日	敦煌鎮官經生師令狐崇哲所寫經成訖竟
8	513	北京故宮	卷卅一	延昌二年四月十五日	敦煌鎮經生曹法壽寫所寫此經成訖。典經師令狐崇哲
9	513	大谷敦 1-004	卷卅七	延昌二年七月十八日	敦煌鎮經生張顯昌所寫經成訖竟，典經師令狐崇哲
10	513	北三井 025-14-2【疑 偽】 ¹⁵	卷卅六	延昌二年	敦煌鎮經生和常太寫隋大隨開皇三年歲在癸卯五月十五日武侯師都督前治會稽縣令宋紹演……
11	522	S.2724	卷第三	大魏正光三年四月八日	比丘法定寫
12	523	中村不折 23 (吐峪溝)	卷第廿九	梁普通四年四月	正法無盡藏寫
13	541	瓜.18510	卷第廿五		敦煌鄧季彥妻元法英所供養經 ¹⁶
14	561	北大 D129	卷十二	北周保定元年	高弼為亡妻元聖威所寫經 ¹⁷
15	561	天津藝術館 005	卷十四	同上	同上
16	561	S.4252	卷廿	同上	同上

¹⁵ 赤尾榮慶：〈書誌学的観点から見た敦煌写本と偽写本をめぐる問題〉（特集 敦煌学の百年），《佛教藝術》271，2003.1，頁 33-47。

¹⁶ 鄧季彥又作鄧彥，北魏東陽王元榮之婿，魏末敦煌郡太守，西魏大統七年(541)左右，榮死，子康襲位。不久殺康，為瓜州刺史，稱其妻元法英為昌樂公主。敦煌寫卷存有多件元法英供養經，如：《敦煌秘笈》羽 1《摩訶衍經卷第八》（大智度論卷八）題記：「大魏大統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佛弟子瓜州刺史鄧彥妻樂昌公主元敬寫《摩訶衍經》一百卷……普及含生，同成正覺」；P.3312《賢愚經卷第一》題記：「敦煌太守鄧彥妻元法英供養為一切」；甘肅博物館藏 004《賢愚經卷第二》題記：「敦煌太守鄧季彥妻元法英供養為一切」。

¹⁷ 高弼又名高長弼，為高歡從祖兄子，高永樂之弟。敦煌文獻中，有關高弼及其妻元聖威的寫經計有 13 件。除上舉《大方廣佛華嚴經》殘卷 5 件外，《貞松堂藏西陲秘籍叢殘》載有羅振玉舊藏《大集經》卷第十九，有題記：「清信女元聖威所供養經」。其餘都是「高弼為亡妻元聖威所寫經」。當中蘭州某人藏經名不詳的寫卷，題記有：「保定元年十月甲戌朔十二日乙酉柱國杞公高弼為亡妻元聖威所寫經」。按：保定為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年號，保定元年為西元 561 年。其他 12 件寫經除《大集經》卷第十九為元聖威生前的供養經，抄寫時代略早外，其他 11 件「高弼為亡妻元聖威所寫經」應該都是保定元年所寫。據《魏書》卷三十二《高湖傳》附傳及《北史》卷五十一《齊宗室諸王傳》載，可知高弼在北齊文宣帝時從南營州叛逃到突厥。極有可能轉道突厥而到北周，定居敦煌，被北周封為柱國杞公。參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年 5 月，頁 208。

17	561	φ264+浙敦 12	卷卅四	同上	同上
18	583	BD985	卷廿二		優婆夷邑敬造供養
19	583	有鄰館	卷卅七	開皇三年十月八日	優婆夷邑敬造供養
20	597	中村不折 55	卷四	隋開皇十七年四月一日	清信優婆夷袁敬姿題記 ¹⁸
21	597	上圖 92	卷七	同上	同上
22	597	S.2527	卷九	同上	同上
23	597	上圖 22	卷十四	同上	同上
24	597	大谷家二樂莊	卷十五	同上	同上
25	597	S.6650	卷卅	同上	同上
26	597	上圖 67	卷卅三	同上	同上
27	597	P.2144	卷卅七	同上	同上
28	597	S.4520	卷卅七	同上	同上
29	597	S.1529	卷卅九	同上	同上

其他如 BD4332《華嚴經》卷卅，楊法仲所供養經，雖年代不可確考，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著錄作「年次未詳，大約五世紀」。比丘僧道祥供養的《華嚴經》寫卷，有 S.1651 卷四、S.1608 卷卅三、BD14438 卷卅六；比丘曇永詠所供養，上圖 32 卷二、S.5361 卷十九；佛弟子蘇成供養，BD07786 卷廿二；尚生書，S.593 卷廿七；比丘曇威供養，S.2245 卷九；比丘德仁所供養，S.6476 卷卅九。這些寫卷雖年代不可確考，但據其紙張、行款、書法、字體風格觀之，自來學者也都定為 6 世紀寫本，也就是南北朝至隋，如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著錄作「年次未詳，大約六世紀」。

從敦煌吐魯番寫本遺存呈現的情況來考察，與經錄、史傳資料有關晉譯《華嚴經》的記載顯然極為契合，再度印證五十華嚴與六十華嚴同為佛馱跋陀羅所譯。初譯時，是以五十卷本流傳，後來人們又將其再重開分為六十卷本。隋代以前，盛行五十卷本，隋代以下的經錄則開始出現有六十華嚴的著錄，其時五十卷本仍同時流通。梁·寶唱成書於天監十五年(516)的《經律異相》全書引用《華嚴經》所註明的卷數，經莊慧娟比對¹⁹，均與五十卷本卷次相同，也是符合僧祐《出三藏

¹⁸ 題記：「開皇十七年四月一日，清信優婆夷袁敬姿，謹減身口之費，敬造此經一部，永劫供養。願從今已去，災障殄除，福慶臻集，國界永隆，萬民安泰。七世久遠，一切先靈，並願離苦獲安，遊神淨國，罪滅福生，無諸障累。三界六道，怨親平等，普共含生，同昇佛地。」

¹⁹ 我指導莊慧娟撰寫《敦煌本〈五十華嚴〉之文獻研究》論文，令她試著從唐前大型佛教類書過濾援引《華嚴經》的情形，考察其所據系統。其中檢出梁·寶唱《經律異相》援引標示出「出《華嚴經》第××卷」均與卷次內容均合於五十卷本。

記集》記述佛馱跋陀羅譯的《華嚴經》為五十卷。如：《經律異相》卷 3「閻浮提十大山二 大地有十大山王：一雪山王、……九宿慧山王、十須彌山王（出《華嚴經》第二十二卷）引文對應《中華大藏經》五十卷本卷 22(12-282c7-c11)，《大正藏》六十卷本卷 27。(T09n0278_p0574c25-c28)又卷 2：「天寶女口密十 自在天王天有寶女名曰善口……隨其所應悉令開解。（出華嚴經第二十九卷）引文對應《中華大藏經》五十卷本卷 29(12-355c19-356a2)，《大正藏》六十卷本卷 34(T09n0278_p574c25-c28)。

五、晉譯《華嚴經》的翻譯與重開

中國古代佛經的漢譯，主要採用「譯場」的方式來進行，即在寺院道場，集合眾人在分工制度下從事譯經工作。譯場的領導者大多由天竺或西域入華的高僧擔任「主譯」，以其精通佛理，但一般不諳漢文，故另有「傳語」、「筆受」協助翻成漢語、譯成漢文。其間，集合道俗信眾，邊譯邊講，闡明經文的奧義，更有交辯文旨，臨機釋滯，以期經文的信達流暢。譯經歷程《高僧傳》〈譯經傳〉多有詳載。東晉·佛馱跋陀羅《華嚴經》漢譯的過程，包括所據梵本的來源，翻譯的時間、地點、參與的人員與過程，史傳中也有所記述，有助於我們對晉譯《華嚴經》翻譯與重開的初步瞭解。

（一）史料所見晉譯《華嚴經》譯經與重開的記述

佛馱跋陀羅(359-429)，音譯又稱佛馱跋陀羅、佛大跋陀、佛度跋陀羅，《出三藏記集》漢譯作佛賢，《高僧傳》作覺賢，是古印度迦毗羅衛國人，為南北朝時期著名譯經師。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四〈佛大跋陀傳〉第四，慧皎(497-554)《高僧傳》卷二「譯經上」〈晉京師道場寺佛馱跋陀羅傳〉²⁰均有記敘。慧皎《高僧傳》大抵是以《出三藏記集》為基礎，參酌其他資料潤色成篇，所以內容無甚差異。

有關《華嚴經》各品單行的漢譯本，東晉·佛馱跋陀羅之前已有十多種，如十地品、十住品、性起品等異譯本的流通。三十四品《華嚴經》完本的譯出，是佛馱跋陀羅的偉大功績，也是《華嚴經》傳播史的大事。《出三藏記集》〈佛大跋陀傳〉記敘有關佛馱跋陀羅翻譯《華嚴經》的情形說：「先是，支法領於于闐國所，得華嚴經胡本三萬六千偈，未有宣譯。到義熙十四年(418)，吳郡內史孟顛、右衛將軍褚叔度，即請佛賢為譯匠，乃手執梵文，共沙門慧嚴、慧義等百有餘人。銓定文旨，會通華戎，妙得經體。故道場寺猶有華嚴堂焉。」(CBETA, T55, no. 2145, p. 104a19-24)

²⁰ 《高僧傳》卷 2：佛馱跋陀羅六(CBETA, T50, no. 2059, pp. 334b26-335c14)。

另卷九「《華嚴經記》第一 出經後記」下云：「《華嚴經》胡本凡十萬偈。昔道人支法領。從于闐得此三萬六千偈，以晉義熙十四年，歲次鶉火，三月十日，於揚州司空謝石所立道場寺，請天竺禪師佛度跋陀羅手執梵文，譯胡為晉，沙門釋法業親從筆受。時吳郡內史孟顛、右衛將軍褚叔度為檀越。至元熙二年六月十日出訖。凡再校胡本，至大宋永初二年，辛丑之歲，十二月二十八日校畢。」(CBETA, T55, no. 2145, pp. 60c29-61a8)

《出三藏記集》全書十五卷，卷一為撰緣記，卷二至卷五為詮名錄，卷六至卷十二為總經序，卷十三至卷十五為述列傳。有關佛陀跋陀羅翻譯《華嚴經》在詮名錄、總經序及述列傳均有涉及，是有關佛陀跋陀羅傳記資料最早、最完備的。

綜合以上的記述得知：義熙九年(413)春，佛馱跋陀羅受劉裕（即後來的宋武帝）之邀，自長安來到劉宋時期南方佛教中心之一位於建康的道場寺。同年秋，法顯也到道場寺，共同譯出《摩訶僧祇律》、《大般泥洹經》。義熙十四年(418)佛馱跋陀羅據支法領從于闐請回胡本（梵本）的《華嚴經》，主譯出完本的《華嚴經》五十卷，翻譯工作的筆受是由法業擔任²¹，另參與翻譯工作的還有慧嚴、慧義等沙門一百多人，道場寺內還別設有「華嚴堂」。譯經工作從晉安帝義熙十四年(418)開始，費時約一年半，於元熙二年六月十日完成翻譯，隔年，永初二年(421)十二月二十八日校定完畢。全書五十卷。²²

木村清孝《中國華嚴思想史》²³一書中以為僧祐所述胡本《華嚴經》的傳入及佛馱跋陀羅翻譯的時間地點及相關歷程大抵可信。不過木村教授特別注意到《出三藏記集》〈佛大跋陀傳〉與《高僧傳》與〈出經後記〉的一些相違點。即：「請佛馱跋陀羅翻譯的，並非支法領，而是孟顛與褚叔度。」他還據《法經錄》著錄《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並未言及五十卷，推測「改變為六十卷本應該是在同錄完成的開皇十四年(594)以前，而在此年六十卷本已是盛行於世」。並指出：「六

²¹ 按：梁《出三藏記集》《高僧傳》「共沙門法業、慧嚴等百有餘人，於道場譯出。」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7：「華嚴經五十卷……方便心論一卷（共法業出見高僧傳）右一十五部一百一十五卷。安帝世。北天竺國三藏禪師佛馱跋陀羅。晉言覺賢。於楊都及廬山二處譯。沙門法業慧嚴慧嚴等詳共筆受。」(CBETA, T49, no. 2034, p. 71a8-b3)《三寶記》著錄應該是指佛馱跋陀羅所譯的華嚴經等十五部筆受分別由法業、慧義、慧嚴等承擔。唐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第一中則專指譯支法領從于闐所三萬六千偈經為《華嚴經》五十卷，說：「沙門法業及慧嚴慧觀等親從筆受。」(CBETA, T35, no. 1733, p. 122c19)筆受由法業一人，增加了慧嚴及慧觀二位。按：《高僧傳·曇斌傳》中。因有曇斌向法業學《華嚴經》和《雜心論》的記事，因此確實是通達《華嚴經》的人吧。其與《華嚴經》的譯出有關係，也是不違常理的。

²² 木村清孝注意到：《出三藏記集》〈佛大跋陀傳〉、《高僧傳》以及《華嚴經》之〈出經後記〉有關本經譯出的記載，有一些相違點。如：請佛馱跋陀羅翻譯的，並非支法領，而是孟顛和褚叔度。又被附加之點是：參加譯場工作的除了法業之外，尚有慧嚴，合計約有百餘人，以及譯出的年月日和校訂記載的有無等。

²³ 參木村清孝著、李惠英譯《中國華嚴思想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頁29-33。

十卷《華嚴經》開始流行之後，從來的五十卷本也沒有消失之事。」「由法藏稱中國來的《華嚴經》為『六十卷本』可知，在初唐時代，這已成為一般普遍化的事了。」

我較為注意有關此經翻譯時何人筆受的問題。對此，隋代以前記述較為籠統而分歧。梁·僧祐《出三藏記集》〈新集撰出經律論第一〉著錄《大方廣佛華嚴經》五十卷下僅提到「於道場寺譯出」而已；同書〈佛大跋陀傳〉則更有說：「共沙門慧嚴、慧義等百有餘人。銓定文旨，會通華戎，妙得經體。」（慧皎《高僧傳》相同），並沒有說明何人筆受。又同書卷九的「《華嚴經記》第一 出經後記」則說：「譯胡為晉，沙門釋法業親從筆受。」或可解釋為經錄、傳記與出經後記體例有別，詳略不一。但此經翻譯筆受者，僅提法業一人。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 7 著錄佛跋陀羅所譯經有云：「《華嚴經》五十卷……《方便心論》一卷（共法業出，見《高僧傳》）右一十五部一百一十五卷。安帝世，北天竺國三藏禪師佛跋陀羅，晉言覺賢，於楊都及廬山二處譯。沙門法業、慧義、慧嚴等詳共筆受。」（CBETA, T49, no. 2034, p. 71a8-b3）唐·道宣《大唐內典錄》同。如此著錄應該是指佛跋陀羅所譯的經典《華嚴經》等十五部，是分別在廬山及楊州時所譯，而擔任各部經典翻譯的筆受工作，是分別由法業、慧義、慧嚴等承擔。唐·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第一說：「沙門法業及慧嚴、慧觀等親從筆受。」（CBETA, T35, no. 1733, p. 122c19）則是專指佛跋陀羅譯支法領從于闐所請的三萬六千偈經為《華嚴經》五十卷，其筆受者則由法業一人外，增加了慧嚴及慧觀二位，顯然對僧祐「共沙門慧嚴、慧義等百有餘人」費長房《歷代三寶紀》、道宣《大唐內典錄》「沙門法業、慧義、慧嚴等詳共筆受。」不僅有了不同的理解，並出現了慧觀，而不提慧義。之後法藏弟子惠英於建中四年（783）編成《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二卷，後四明山胡幽貞重新整理成一卷。其中也說：「於建業謝司空寺造護淨法堂，翻譯《華嚴》。當譯經時，……同翻譯沙門惠業、惠嚴、惠觀等，從三藏筆受。」應是承師說，也說明此說成為唐代以後流行的說法。唐人慧多寫作惠，不過其中惠業當作法業，蓋涉下文類化而致訛。

（二）晉譯《華嚴經》五十卷本何人重開為六十卷？

前提木村教授的推論與說法，我們從經錄、藏經及史料所見晉譯《華嚴經》的記述情況可以得到印證，大抵可信。不過他也對：「何時？是誰？將其改為六十卷本的呢？」等問題發出了：「沒有可明確回答此問題的資料」的遺憾與感嘆。

確實，對於五十卷本如何分為六十卷？何時分卷？以及怎樣分卷等問題，唐前經錄、史傳均不得其詳。儘管如此，但我們綜合經錄與史傳資料有關晉譯《華嚴經》的記載可獲致一個共識，就是：五十華嚴與六十華嚴同為佛跋陀羅所譯。初譯之時，完成的是以五十卷本流傳，後來人們才又將五十卷本重開成為六十卷

本。隋以下的經錄已有六十華嚴的著錄，而與五十卷本同時流通。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慧皎《高僧傳》等隋以前的經錄、僧傳提及東晉佛馱跋陀羅翻譯的《華嚴經》均作五十卷，並未見有六十卷本及重開的記述。隋代《法經錄》、《歷代三寶記》開始，及其後唐代《大唐內典錄》、《開元釋教錄》等，著錄六十卷本時多同時標示有「或五十卷」。這些著錄呈現出隋以後是以六十卷為主要傳本，而五十卷本是並存的。但是並未見關於六十卷本如何產生及何時產生的記述。

對此問題我以為文獻載籍可提供補充，有助進一步理解，例如晚唐時新羅的崔致遠(857-?)他在為唐朝佛學高僧賢首國師，華嚴宗三祖法藏和尚撰寫的《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中，歷敘《華嚴》經的流傳時，曾有如此的記述：「夫《華嚴》大不思議經者，乃常寂光如來於寂場中覺樹下，與十方諸佛召塵沙菩薩而所說也。龍勝誦傳下本滿十萬偈。東晉廬山釋慧遠以經流江東，多有未備，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踰越沙雪，遠尋眾經。法領遂至遮拘槃國，求得前分三萬六千偈來歸。時有佛賢三藏，為偽秦所擯，投趾東林。遠善視之，馳使飛書，解其擯事。賢後至建康，於道場寺譯出領所獲偈。南林寺法業筆受，成五十卷。則知西天應北天之運契期金水之年，東林助南林之緣發光木火之用。共成大事益耀中華。……東安寺慧嚴、道場寺慧觀及學士謝靈運等，潤文分成六十卷。」(CBETA, T50, no. 2054, pp. 281c21-282a4)

這段對《華嚴經》傳入中土，晉譯過程的記敘，大抵繼承僧祐出《三藏記集》及其他資料的統整，更有了「南林寺法業筆受，成五十卷。則知西天應北天之運契期金水之年，東林助南林之緣發光木火之用。共成大事益耀中華。……東安寺慧嚴、道場寺慧觀及學士謝靈運等，潤文分成六十卷。」詳細的譯經分工，當是六十卷本廣為流行後的補述，特別強調五十卷本《華嚴經》是佛賢三藏（即覺賢）翻譯自廬山慧遠弟子法領所攜回的「前分三萬六千偈」，南林寺法業筆受。之後，東安寺慧嚴、道場寺慧觀及學士謝靈運「潤文」成六十卷本《華嚴經》。雖然這些訊息均未見於慧嚴、慧觀及謝靈運的傳記資料中，對其確實性宜有所保留，然當是唐代普遍流傳的說法，才被崔致遠援入《法藏和尚傳》中。

南朝大詩人謝靈運(385-433)為東晉將領謝玄的孫子，十八歲襲封康樂公，世稱謝康樂。406年出仕。義熙八年(412)，返京任秘書丞。義熙十一年(415)，轉中書侍郎。義熙十四年(418)，劉裕在彭城建宋國，謝靈運任宋國黃門侍郎。此年正是佛馱跋陀羅在揚州（建康）道場寺開始主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元熙二年(420)即宋永初元年，《大方廣佛華嚴經》翻譯完成，時謝靈運三十六歲。依時間、空間推論，謝靈運參與佛馱跋陀羅主譯《華嚴經》的活動，是極有可能。謝靈運參與

翻譯佛經，對梵文略有認識，佛教經錄及史傳均載錄他曾潤飾《大般涅槃經》，撰寫《十四音訓敘》以註解《大般涅槃經·文字品》等事。但南朝、隋的內外典籍、傳記史料均未見有關謝靈運參與佛馱跋陀羅主譯《華嚴經》翻譯的任何記載。

崔致遠《法藏和尚傳》提及謝靈運參與佛馱跋陀羅在建康道場寺翻譯《華嚴經》從事潤飾文字、編定卷帙，完成五十卷本重開為六十卷的具體工作。除了時間、空間背景具合理性外，可能還是出於謝靈運曾與慧嚴、慧觀對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三十六卷進行再治《南本涅槃經》因而做出的類推。²⁴按：《大般涅槃經》漢譯現存有：東晉·法顯、佛大跋陀、寶雲等合譯《大般泥洹經》六卷；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四十卷，也稱作「北本」；劉宋·慧嚴、慧觀、謝靈運等依以上兩種譯本為基礎，合本對照修治而成的《大般涅槃經》三十六卷，世稱「南本」。南本相較於北本，義理相一致，品數更詳細，文字更流暢，易為初學者掌握，在南朝時期盛行，極具影響力。所以唐·道宣《大唐內典錄》著錄《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時，還特別標注「或五十卷者南本」。

然而，唐以前謝靈運、慧嚴、慧觀等人的相關資料均未曾被提及，尤其梁·僧祐(445-518)與謝靈運(385-433)的時代及譯經的時間相差不過幾十年；僧祐乃齊、梁高僧，佛教界領袖，又建康同為他們主要活動的地點，若有謝靈運與東安寺慧嚴、道場寺慧觀有對佛馱跋陀羅主譯《華嚴經》五十卷進行「潤文」，重開成六十卷本，如此重要的佛教盛事，似乎沒有理由毫無所悉，即使是傳聞，《出三藏集》、《高僧傳》等也當會有所言及。又唐·釋智昇撰編的《開元釋教錄》是唐代佛典目錄中最詳實而權威之作，其著錄《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後明白注說：「初出元五十卷，後人分為六十。」若是出自謝靈運或傳說為謝靈運，斷不會說「後人分為六十」。是此一記述的確實性實有待保留。

(三) 晉譯《華嚴經》五十卷本為何重開？如何重開？

從上文提及晚唐·崔致遠《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有關五十卷本《華嚴經》譯出後，不久東安寺慧嚴、道場寺慧觀及學士謝靈運等，再加以潤文分成六十卷的記敘，至少給了我們晉譯《華嚴經》五十卷本重開為六十卷一個合理的推測，或傳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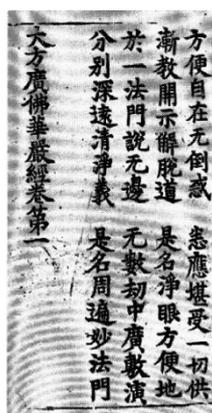
至於五十卷本為何重開？傅及斯論文中提及方廣錫以為：「分卷問題取決於紙張的大小，紙張大小決定了每卷所能承載的字數，因而不同時期的紙張會導致不

²⁴ 《高僧傳》卷7：「《大涅槃經》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數疎簡，初學難以措懷。嚴迺共慧觀、謝靈運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過質，頗亦治改，始有數本流行。」(CBETA, T50, no. 2059, p. 368a20-23)

一樣的佛經分卷。」²⁵這是合理的推論。關於敦煌寫卷所使用的紙張，吳其昱先生曾根據『法藏敦煌寫本目錄』第一冊、第三冊抄寫年月的寫本所用紙張的記述，以及戴仁(J.-P.Drège)「Papies de Dunhuang」(〈敦煌寫本用紙〉) T'oung Pao (『通報』) vol.LXVII,3-5(1981)的記述，統整表列：五世紀用紙高 24.5~26，長 41~43；六世紀高 25.5~27.5，長 36.5~52；七世紀高 25.5~26.5，長 42~51；八世紀高 25.5~28.5，長 38~47；九世紀高 27.5~31，長 41~46；十世紀高 28.5~30，長 42~46。²⁶證明確實紙張大小，各時期不一。

佛教寫經，不但紙張大小，行數也不一、每行字數多寡不定，這都會影響每紙的字數。官方標準寫經，行數字數較為固定；民間供養經及日常用經，其行數多寡、字數疏密大多不一，尤其日常用經為省紙張，行款更密，字數更多。但無論如何，紙張大小與卷數並沒有直接關係，蓋因每卷佛經用紙數量並無定製。如：同為北魏延昌二年(513)敦煌鎮官經生令狐崇哲、令狐禮太所寫的《華嚴經》，其各卷卷末題記均有標示「用紙××張」。如卷八、卷十六、卷二十四、卷三十五、卷三九、卷卅一、卷卅七，其標示每卷紙張用量，有從二十一張到二十四張的不同。而延昌元年(512)官經生所寫《成實論》卷十四，標示「用紙廿八張」、延昌三年(514)《小品經》卷八標示「用紙廿六張」、北魏神龜元年(518)經生張鳳鸞所寫《維摩詰經卷上》標示「用紙廿九張」、神龜二年《摩訶衍經》卷卅一標示「用紙卅張」。是知每卷用紙數無定制，當是隨每卷篇幅多少而定。因此，五十卷本重開為六十卷紙張大小當不是原因。

至於晉譯《華嚴經》五十卷本如何重開為六十卷本，其卷次品第開合的具體情況如何？我們可從《中華大藏經》第 12 冊，以趙城金藏金廣勝寺本為主的五十卷本及《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9 冊所收佛陀跋陀羅譯《華嚴經》即六十卷本，進行考察。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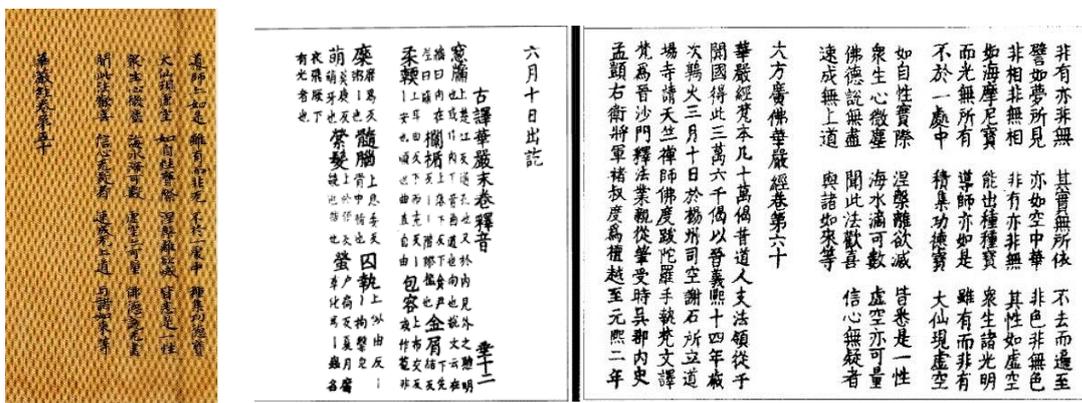


衆生一見如來身 悉能斷除衆煩惱
 遠離一切諸魔事 是名清淨妙境界
 佛於一切大衆海 處此衆會悉遍照
 普爲衆生雨法雨 是名普音稱法門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一

²⁵ 傅及斯：《敦煌本〈華嚴經〉整理與研究》，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年，頁154。

²⁶ 吳其昱：〈敦煌漢文寫本概論〉，載：《講座敦煌第五卷 敦煌漢文文獻》，東京：大東出版社 東京，1992.3，頁18-19。

上圖左為敦煌寫本 BD04031 尾題：「華嚴經卷第一」內容訖：「分別深遠清淨義，是名周遍妙法門。」與湖林博物館藏初雕高麗藏（上圖中）、宮本、《中華藏》金廣勝寺本開合卷次品第均同。與六十卷本開合卷次品第不同，內容文字對應《大正藏》《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本卷 2(CBETA, 09, no. 278, p. 401c16)。



左圖為《敦煌秘笈》羽 179 尾題：「華嚴經卷第五十」，經文訖：「聞此法歡喜，信心無疑者，速成無上道，與諸如來等。」內容文字對應《大正藏》《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本卷 60 (CBETA, T09, no. 278, p. 788a29-b9)。《大正藏》後有《華嚴經出經記》「《華嚴經》……出訖」一百零八字，宋本、宮本及《中華大藏經》五十卷本並無。南宋理宗至元英宗至治二年間(1225-1322)的《磧砂藏》《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六十》卷末有附記（上右圖）。

《中華藏》五十卷本卷一，33 紙，每紙 23 行，計 629 行，行 14 字。首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一》，次行題：「世間淨眼品第一」。卷尾訖：「分別深遠清淨義，是名周遍妙法門」，尾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一》。《大正藏》卷一，18 紙（欄），每紙（欄）29 行，計 514 行。行 17 字或 16 字。首題同。次題作「世間淨眼品第一之一」。五十卷本卷一，訖：「分別深遠清淨義，是名周遍妙法門」對應《大正藏》卷二第 72 行。《大正藏》卷一，訖：「普為眾生兩法兩，是名普音稱法門」對應《中華藏》卷一第 556 行。《中華藏》第 557 行，對應《大正藏》卷二開頭。《大正藏》前有《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世間淨眼品第一之二〉。

《中華藏》卷二，30 紙，每紙 23 行，計 680 行，行 14 字。首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次行題：〈世間淨眼品第一之二〉。起「復有月天子於調伏眾生普照法界」對應於《大正藏》卷二第 73 行。第 326 行「十方一切世界亦復如是」後有中題〈大方廣佛華嚴經盧舍那佛品第二之一〉《大正藏》在卷二第 370 行。卷尾訖：「無量甚深廣智慧海，願轉清淨妙法輪」尾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大正藏》卷第二，18 紙半（欄），每紙（欄）29 行，計 528 行。行 17 字或 16 字。首題同。次題作「世間淨眼品第一之二」起「復有釋提桓因，於三世佛出興住滅決定」，對應五

十卷本卷一 557 行。《大正藏》卷二，訖「在東北方清淨光明不可盡師子座上，結跏趺坐。」對應《中華藏》卷二第 504 行。《中華藏》第 505 行，對應《大正藏》卷三卷首。《大正藏》前有《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三》〈盧舍那佛品第二之二〉。

《中華藏》卷三，33 紙，每紙 23 行，計 742 行，行 14 字。首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三》，次行題：〈盧舍那佛品第二之二〉。起「爾時普賢菩薩承佛神力觀察一切諸世界」對應於《大正藏》卷三第 166 行。第 416 行「佛白毫相出寶王，其光明耀等如來」對應《大正藏》卷三卷末。卷尾訖：「入一切法方便海三昧」對應《大正藏》卷四第 338 行。

《大正藏》卷第三，21 紙（欄），每紙（欄）29 行，計 610 行。行 17 字或 16 字。首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三》，次題作「盧舍那佛品第二之二」起「此世界海下方，次有世界海」，對應五十卷本卷二 506 行。《大正藏》卷三，訖「佛白毫相出寶王，其光明耀等如來。」對應《中華藏》卷三第 439 行。《中華藏》第 440 行，對應《大正藏》卷四卷首。《大正藏》前有《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四》〈盧舍那佛品第二之三〉。

晉譯《華嚴經》凡三十四品，各品或有分節，五十卷本計分 74 節，六十卷本計分 80 節。其不同如下：

品題	五十卷本節次	六十卷本節次
盧舍那佛品第二	2	3
四諦品第四	1	2
菩薩雲集妙聖殿上說偈品第十	1	2
金剛幢菩薩迴向品第二十一	7	9
十地品之二十二	6	5
入法界品第三十四	14	17

除了卷次與品第開合不同外，也有少數明顯字句的差異，如〈入法界品第三十四之十二〉，《大正藏》六十卷本卷 57：「爾時，摩耶夫人告善財童子言：『善男子！於此世界三十三天，有王名正念王，有童女名天主光。汝詣彼問云何菩薩學菩薩行、修菩薩道。』」（CBETA, T09, no. 278, p. 765a3-7）《中華藏》五十卷本卷 48：「善男子於此世界中忉利天上，是有天名正念，彼天有女」（12-589c13-14）「爾時，摩耶夫人告善財童子言」《中華藏》《宮本》等五十卷本無，六十卷有²⁷；五十卷「忉利天」，六十卷本作「三十三天」蓋採用意譯。

²⁷ 按：六十卷本這段文字，與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於唐睿宗文明元年(684)，補充《華嚴經》缺失所譯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CBETA, T10, no. 295, p. 876b3-9)文字全同。當是後人具以補入六十卷本。

又如《大正藏》六十卷本卷 25〈十地品第二十二之四〉：「滅除心惡垢，名尸波羅蜜，不為六塵傷，羶提波羅蜜，能起轉勝法，精進波羅蜜，於是道不動，名禪波羅蜜，無生忍照明，般若波羅蜜，迴向於佛道，方便波羅蜜，求於轉勝法，名願波羅蜜，無有能壞者，名力波羅蜜，能解如實說，名智波羅蜜。」(CBETA, T09, no. 278, p. 563a28-b7)對應《中華藏》五十卷本卷 21 第 453~456 行。「名尸波羅蜜」等八句四十字（如加黑字），《中華藏》、《宮本》均無。

至於文本內容可說毫無差別，所以木村清孝說：「漢譯《華嚴經》由五十卷本，轉為六十卷本的整體性變化，好像只不過是分卷的變化而已。為什麼呢？因為沒有資料言及其中內容的變化。上所言及的舊宋本，與六十卷本諸本相比較，也沒有較醒目的不同。進而，即使說是六十卷本，由現行諸本中，分卷方法有異同可知，最初分卷方法好像即無統一。因此，於南北朝的某一時期，佛馱跋陀羅譯的《華嚴經》，只是於方便上被分為六十卷，而後即成了一般化。但是，其立場並未統合於佛教界全體，有人繼續使用從來的五十卷本，有人則另立別的分卷方法，是可以想像的。」²⁸木村教授說法大抵不錯。但從敦煌本所呈現的寫卷情況看，似乎六世紀以前也就是南北朝到隋，佛馱跋陀羅譯的《華嚴經》似乎不見六十卷本的流傳，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否意味著六十卷本的出現是在隋代才有，以後才逐漸成為主要的傳本。謝靈運與慧嚴、慧觀「潤文」成六十卷本的說法極可能是唐代的追述或附會。

再者，我們如果仔細比對敦煌本，還是會發現五十卷本與六十卷多少有些歧異。即使傳世的五十卷本日本宮內省圖書寮一切經（宮本），趙城金藏廣勝寺本，也與敦煌本不盡相同。如：BD0656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殘卷，首尾俱殘。存 27 紙，每紙 22 行，存 531 行，行 17 字，隸楷。文本對應《大正藏》六十卷本卷十九「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第二十一之六」的後部分及卷二十同品「第二十一之七」的前部分(CBETA, T09, no. 278, p. 520a16-526b23)與六十卷本卷次開合不同。第 362 行：「佛子！何等為菩薩摩訶薩第八如相迴向？」前部與後部《大正藏》六十卷本與《中華藏》、《宮本》五卷本分卷不同。均與敦煌本不同。見下圖：



²⁸ 木村清孝著、李惠英譯《中國華嚴思想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 年，頁 33。

前部《大正藏》《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9：「無量功德悉迴向，一切疑惑悉除滅。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九」(CBETA, T09, no. 278, p. 524b11-12)後部《中華藏》、宮本作《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六》。「佛子！何等為菩薩摩訶薩第八如相迴向？」《大正藏》《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0：「《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十》〈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第二十一之七〉」(CBETA, T09, no. 278, p. 524b15-19)《中華藏》、《宮本》作「《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七》〈迴向品之六〉」。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七
東晉天竺三藏佛跋陀羅譯

迴向品之六

佛子何等為菩薩摩訶薩第八如相迴向佛子此菩薩摩訶薩成就念智安住不動離癡正念直心不動成就堅固不可壞業一切智境界得不退轉得大乘勇猛無畏之心修習無盡善根積集勝妙善根修白淨法增長大悲得正真實常能正念一切諸佛白淨法迴向心不退轉樂求菩薩道巧妙方便出生清淨堅固善根正念修習智慧功德為調御師具足出生一切善根智慧方便迴向眾生慈眼清淨能觀察一切善根長養无量種種善根分別境界善根具足善根清淨善根一向善根修習善根行善根思惟善根平等廣說善根善根摩訶薩如是善根有種種門種種境界種種相種種事種種分別無量行元量語言道出生無量分別行種種莊嚴善根悉能正持十力諸乘善權

功德大海悉迴向 饒益安樂諸群生
我所修行諸功德 普令一切悉清淨
諸佛清淨無倫匹 普令世間亦如是
平等善根悉迴向 令一切來知實義
微妙智慧功德滿 悉與一切如來等
菩薩觀察一切法 世間寂滅空無餘
無有造作無造者 亦復不壞諸業報
於彼靜亂無有二 悉以等心正觀察
菩薩真實解世間 遠離一切諸虛虛
如是真實佛子等 從諸如來法化生
無量功德悉迴向 一切疑惑悉除滅。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九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十

東晉天竺三藏佛跋陀羅譯

①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第二十一之⑦七

佛子。何等為菩薩摩訶薩第八如相迴向。離癡正念。直心不動。成就堅固不可壞業。一切智境界得不退轉。得大乘勇猛無畏之心。修習無盡善根。積集勝妙善根。修白淨法。增長大悲。得正真實。常能正念。一切諸佛白淨法。迴向心不退轉。樂求菩薩道。巧妙方便。出生清淨堅固善根。正念修習智慧功德。為調御師。具足出生一切善根。智慧方便。迴向眾生。慧眼清淨。悉能觀察一切善根。長養無量種種善根。分別境界善根。具

不僅如此，敦煌寫本五十卷本的《華嚴經》殘卷中，其所呈現的分卷內容也存在著一些不統一的現象，所以方廣錫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漢文獻》的著錄與敘錄中，除「晉譯五十卷本」外，還每每有「晉譯五十異本」(如 BD03440、BD06247)、「晉譯五十卷本 宮本」(如 BD07964)等的標示。傅及斯敘錄其他敦煌本《華嚴經》時也採取此一方法，如對 S.00593、S.04520、P2110、φ149、敦博 005、上圖 022、中村 026……等定名為「晉譯五十異本」。

我們從事文獻整理研究時，不難發覺寫本與刻本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主要在於寫本文獻，抄寫多具隨意性。因此，往往存在書名、篇名不定，篇卷、品次不定，字句不定、用字不定、書寫字體不定……等諸多寫本文化現象。而刻本則是經過編纂，篇卷定本、文本校正，刊刻印行，不論是文本卷次品第、篇名、字句統一，乃至文字亦具規範。張涌泉曾在《敦煌寫本文獻學》一書中提出他整理研

究敦煌寫本文獻的經驗，歸納出敦煌文獻的寫本特徵，第一點即「出分卷不定」，特立專節討論，其中特別強調：「很多古書的分卷在寫本時代往往還不固定，如果按後世刻本生搬硬套，難免犯以今律古的錯誤。」²⁹

六、結語

有關佛馱跋陀羅晉譯華嚴經五十卷本究為何人所重開？又為何而重開？五十卷又如何重開為六十卷？文獻載籍及佛教史料均不甚了了，對此關注華嚴傳播史及佛教文獻學者，雖偶有留心，然終不免有文獻不足，難以究詰之嘆。敦煌文獻中總數逾 400 號的《華嚴經》寫本，有助於此一問題的考察。

上文過濾原卷保有《華嚴經》經題、卷次及品第的寫本，及缺經題卷次的殘卷，持與《大正藏》所收六十卷本《華嚴經》及《中華藏》五十卷本《華嚴經》詳加對照，判別五十卷本的遺存分屬四十一卷次，雖不足以綴成一部完整的五十卷本，但大抵可以勾勒出早期五十卷本流傳的樣態。

又從 29 件原卷有抄寫題記的五十華嚴寫本，可見抄寫年代為南北朝到隋，其字體風格率為隸楷，多北朝寫本。其中北涼王大沮渠安周(444-460)所供養的卷第廿八寫經，距佛馱跋陀羅譯出時間僅晚二、三十年而已。

敦煌寫本遺存呈現的情況，與經錄、史傳資料所載晉譯《華嚴經》的記述相契合。不僅印證了佛馱跋陀羅所譯《華嚴經》，初出以五十卷本流傳，後來有人將其重開為六十卷本。隋前流傳的是五十卷本，隋以下的經錄始有六十卷本的著錄，並與五十卷本同時流通。

晉譯《華嚴經》譯經的記述以梁·僧祐《出三藏記集》為較早且完備，然並無六十卷本的記述，也沒無重開之相關訊息。

有關此經翻譯為何人筆受。隋前記述籠統而分歧，且詳略不一。但此經翻譯筆受者，僅提法業一人。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唐·道宣《大唐內典錄》言「沙門法業、慧義、慧嚴等詳共筆受。」後人誤將佛馱跋陀羅所譯的經典《華嚴經》等十五部的筆受者，繫在《華嚴經》一書的筆受。

唐·崔致遠《法藏和尚傳》出現五十卷本《華嚴經》是法領攜回的「前分三萬六千偈」，由法業筆受。之後，慧嚴、慧觀及謝靈運「潤文」成六十卷本的記述。此為傳記資料中所未見，當是唐人傳說或推測。

²⁹ 張涌泉《敦煌寫本文獻學》，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頁57。

五十卷本為何重開？或以為因不同時期紙張大小不一而重開。但寫本每卷用紙數無定制，衡以敦煌華嚴經早期寫經實際用紙情形，印證五十卷本重開為六十卷紙張大小不是原因。

晉譯《華嚴經》凡三十四品，五十卷重開為六十卷本，主要有卷次開合不同與品第開合不同，品第之中，又有節次的開合不同。除此之外，還有個別文字差異，至於文本內容可說無甚差別。但敦煌寫本五十卷本的《華嚴經》殘卷所呈現的分卷內容，有些存在著不統一的現象，學界或以《華嚴經》五十卷本異系或異本視之，此顯然是寫本時期篇卷不定的現象與特徵。至於深入細緻而較為完整的研究當有待來者。